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二十

商周时期车马埋葬研究

吴晓筠 著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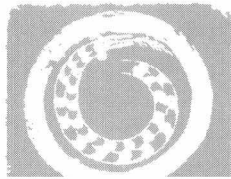


科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二十

商周时期车马埋葬研究

吴晓筠 著



1878.84

W898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周时期车马埋葬研究/吴晓筠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20)

ISBN 978-7-03-025877-9

I. 商… II. 吴… III. 车马坑—研究—中国—商周时代
IV. K878.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6037 号

责任编辑:刘 能 / 责任校对:朱光光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陈 敬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双青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 年 11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9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7 1/4

印数:1—1 200 字数:384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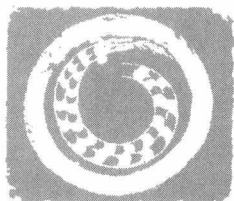
定价:10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双青〉)

Auror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Peking University
Publication Series, No. 20

STUDY ON CHARIOT BURIALS IN EARLY CHINA, 1200-221 BCE

Wu, Hsiao-yun



Science Press
Beijing

序

李伯谦

《商周时期车马埋葬研究》一书，是由吴晓筠的博士学位论文补充修改而成。1997年，吴晓筠由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毕业只身来到北京，以中国古代史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北京大学考古系录取为硕士研究生，师从徐天进教授，她作的硕士论文就是有关古代车马器的。因此，如果从她1999年开始撰写硕士论文算起，到今天博士论文最终修改定稿交付出版，她围绕先秦车马埋葬课题做研究，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

车马埋葬遗迹是商周乃至秦汉时期考古遗存的重要门类之一，随着20世纪20年代时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及安阳殷墟、浚县辛村等地的发现，从考古学角度研究这些遗迹，便成为考古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回顾相关发现和研究历史，正像吴晓筠在该书第一章引论中提到的，石璋如、郭宝钧、林寿晋、张彦煌、张长寿、杨泓、孙机、杨宝成、张岱海、李自智、傅举有、渠川福、郑若葵、黄文新、胡永庆、贺陈弘、杨英杰、曾永义、扬之水、李零、林梅村、王巍以及林巳奈夫、Stuart Piggott、William Watson、Magdalene von Dewall、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Anthony Barbieri-Low等国内外学者，分别在马车结构的复原、车马器、马车的制作、系驾法、车马殉葬制度、马车起源等问题上，都做过深入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收获。吴晓筠《商周时期车马埋葬研究》，正是在一代又一代学者们研究成果基础上，对一系列新发现、新材料进行系统、全面分析研究之后做出的新概括。这部书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1）资料丰富。从殷墟发掘到2008年底止，考古发掘出土的有关车马埋葬的资料，只要是已经公开发表的，基本都已收录。从该书参考书目可知，考古材料一项共收入274部（篇）考古报告或简报，论文一项共收入中文论文126篇、外文论文18篇。书中所附的《商周时期出土马车尺寸登记表》，共收入商代、西周至两周之际、春秋至春秋之际、战国、秦马车237辆，一一标明了其时代、单位号、马数、殉人、轮径、辐数、轮牙宽度、轮牙厚度、毂长、毂径、车舆宽度、车舆深度、车舆高度、辀长、辀径、轴长、轴径、衡长和资料出处。可以说，考古出土的车马埋葬相关资料无一遗漏，研究者提出的各种论断和观点无一遗漏，从而保证该书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

（2）方法科学。掌握了丰富的资料，熟悉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并不保证必然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要有科学的研究方法和途径。吴晓筠在该书第一章引论部分专门交代了该书的研究方法和途径，概括起来说，就是先进行类型学分析，再引入背景考古学

(contextual archaeology) 概念, 进行区位分析。类型学分析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对区位分析可能就略感生疏。其实, 按我的理解, 区位分析就是考古背景分析, “这个背景小到遗存出土的地层、单位、相对位置和共生关系, 大到它所在的遗址、文化和自然与社会环境”。因为“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是特殊的, 是历史传统延续下来的结果。同样一个物体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因此, 任何遗物或遗迹, 都必须放在其存在的区位即考古背景中去分析, 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3) 涵盖面广。从该书涉及的时间范围来说, 从商到秦绵延了一千多年; 从该书涉及的地域范围来说, 涵盖了古代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从该书涉及的内容来说, 包括了独辘马车的起源、马车的结构、马车的复原、马车的分类、马车的装饰、车马器、系驾法以及车马殉葬制度及其演变和分区等与车马埋葬有关的方方面面。可以说这是迄今对车马埋葬相关问题最系统、最全面的一部论著。

(4) 新见迭出。该书在第一章引论中开宗明义指出, 分析考古材料、解释考古材料是构成该书结构的基础。如果说第二章至第四章重点在分析考古材料, 那么第五章的总结和第六章的余论重点就是解释考古材料了。其实阅读该书, 从第二章到第六章甚至某些注释, 处处都可见到作者在分析考古材料、解释考古材料过程中提出的自己的见解和认识, 其中有的原先已经有学者提出过, 但大量的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书中这些新见解、新认识, 因为只看过一遍, 很难件件都记得清楚, 但确有相当一部分给我留有深刻印象:

銮和当卢是周人的发明, 周人马车和商人马车虽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应属两个不同的系统;

商时期车马埋葬主要是贵族身份地位的标志, 发展到西周时期则成了礼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被赋予了礼的意义;

銮是礼车的象征, 西周晚期以降, 銮经常和鼎、簠配套使用, 成为区分贵族等级的一种标志;

春秋中期以后, 銮在车马器中基本消失, 表明在西周时期形成的以銮为中心的车礼器随葬制度走向了终结;

春秋时期, 晋、楚两地在车马坑设置、随葬车马器组合上表现出来的差异表明, 晋地表现的是重在财富占有, 楚地表现的是重在强调死后维持生时的一切享有;

战国时期, 燕下都、辉县琉璃阁车马坑所见随葬前已基本绝迹的西周型式銮铃的现象, 反映了此时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浓厚的复古意味;

大量车马埋葬资料证明, 先秦时期没有真正实行过“列车制度”, 文献所记“遣车视牢具”可能并非统一而普遍的现象……

类似的当然还有很多。这些新见解、新认识, 对于深入了解商周时期车马埋葬现象, 无疑有着重要启发意义。

大海无涯, 学术研究亦无止境。该书尽管搜集了尽可能多的资料, 尽管对资料一一

做了分析、做了解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认识，但是否所有的解释、所有的见解和认识都符合实际、都无懈可击，我想，再自信的学者包括晓筠自己在内，都不敢做这种肯定的断言。虽然我对该书做了充分的肯定，但我同时也认为，其中有些见解可能离实际尚有距离，有些见解可能还需要有更多材料和证据予以证实。例如，作者根据虢国墓地车马坑与主墓关系的统计，认为“虢国墓地车马坑的等级并不是以随葬车马数量的多少来决定，而是更多地取决于车马坑的长度上的倍数关系”。这在虢国墓地的确如此，但从离其不远的晋侯墓地来看，情况并不是这样。北赵晋侯墓地共发现9位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每组晋侯及其夫人墓葬东边都祔葬有一座车马坑，但M8晋献侯及其夫人的车马坑的规模要较其他车马坑大出许多，该车马坑已发掘完毕，内有48辆车105匹马，是已知西周时期车马坑中最大的，远为晋侯墓地其他车马坑所不及。它们之间大小如此悬殊，原因可能非常复杂，虢国墓地的情况似乎不是普遍的规律。

我举出这几个例子，目的不在否定作者的论断，而是要提醒大家，类似的问题还有较大的讨论空间。作者在论及研究方法时，很强调背景关系的分析，这是完全正确的。研究具体问题，如果能在背景关系上再下点工夫，把背景关系理解得更广一些，更远一些，最后做结论时就会更加谨慎，就会有更多的选择，提出更多更过硬的证据。苏秉琦先生用《庄子》中“庖丁解牛”的故事教导我们，做科学研究要做到“游刃有余”，我理解苏先生的意思就是要我们从多方面下手，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甚至不怕反复，只有如此，才能找到问题症结，并最终解决问题，取得成功。愿与大家共勉！

目 录

序	李伯谦(i)
第一章 引论	(1)
第二章 考古所见马车形态的分类研究	(21)
第一节 马车的形态分析	(21)
第二节 马车的分期	(34)
第三节 小结	(41)
第三章 车及车马器埋葬方法分析	(46)
第一节 车马坑的类型分析	(46)
第二节 车马坑车马埋葬方法分析	(48)
第三节 墓葬内车马埋葬方法分析	(61)
第四节 时代与特征	(69)
第五节 其他现象与讨论	(77)
第六节 小结	(87)
第四章 车及车马器所在墓地内的区位分析	(93)
第一节 晚商至西周	(93)
第二节 两周之际——以上村岭虢国墓地为例	(147)
第三节 春秋战国	(155)
第四节 小结	(174)
第五章 总结:考古所见之车马埋葬	(183)
第一节 先秦时期车马埋葬的主要演变阶段与特征	(183)
第二节 车马埋葬的选择问题	(186)
第六章 余论:兵车与礼车	(198)
附表 商周时期出土马车尺寸登记表	(211)
主要参考书目	(232)
Abstract	(256)
后记	(258)

插图目录

图一	高加索地区的鲁查申(Lchashen)遗址出土之木车及其复原	(9)
图二	商代曲衡马车	(22)
图三	桥北 M1 出土马车	(22)
图四	侯家庄 M1003 发现的车舆	(23)
图五	赵卿墓 M251 车马坑 1 号车	(23)
图六	张家川马家塬 M3 四号车	(23)
图七	乙类 A I、A II 式车	(24)
图八	秦车与辇比较	(26)
图九	乙类 A III ~ A XII 式车	(27)
图一〇	包山 2 号墓车器	(29)
图一一	乙类 B 型车	(30)
图一二	乙类 C 型车	(31)
图一三	郑州洼刘西周墓地 2 号车马坑	(32)
图一四	郑韩故城 1 号车马坑“大车”(左)与淄河店 2 号战国墓 11 号车(右)车轡结构比较	(32)
图一五	丙类车	(33)
图一六	各期主要马车样式分期图	(35)
图一七	新郑郑韩故城 1 号车马坑	(39)
图一八	平凉庙庄 1 号车及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比较	(40)
图一九	马鞍冢 2 号车马坑十三号车及秦始皇陵二号铜车马比较	(40)
图二〇	秦车车围结构	(42)
图二一	秦安上袁家 M7 随葬单马马车	(42)
图二二	甲类车马合葬坑	(49)
图二三	乙类车马合葬坑	(51)
图二四	乙类车马合葬坑	(53)
图二五	丙类车马合葬坑	(54)
图二六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于 2001 年 8 月在洛阳市西工区发掘的车坑(1)与马坑(2)	(55)
图二七	车葬坑及甲类 A、B 型马葬坑	(56)

图二八	甲类 C 型、乙类 B 型马葬坑	(58)
图二九	齐故城五号墓殉马坑(甲-C II 式)	(59)
图三〇	北窑马坑 MK693(乙-A 型)	(60)
图三一	甲类 A、B 型墓例	(62)
图三二	甲类 B、E 型墓例	(64)
图三三	乙类 A 型墓例	(65)
图三四	江陵九店 M410	(66)
图三五	丙类 A、B、C 型墓例	(67)
图三六	丙类 D、E、F 型墓例	(68)
图三七	老牛坡 M27 出土车马器	(73)
图三八	凤翔西村 S2 车马坑	(76)
图三九	战国时期大、小车并置的车马坑	(80)
图四〇	秦始皇陵文官俑坑 K0006 内马车遗存	(82)
图四一	车马坑内的殉人	(86)
图四二	殷墟西区第四墓区墓葬分布图	(94)
图四三	殷墟西区第三墓区(西区)墓葬分布图	(95)
图四四	殷墟西区第六墓区(北区)墓葬分布图	(96)
图四五	殷墟西区第六墓区(南区)墓葬分布图	(96)
图四六	殷墟西区第七墓区(北区)墓葬分布图	(97)
图四七	殷墟西区葬车墓葬、车马坑平面图	(98)
图四八	郭家庄北区墓葬分布图	(101)
图四九	第一组陪葬坑平面图	(102)
图五〇	第二组陪葬坑平面图	(102)
图五一	三组陪葬车马坑群与主墓之间的空间关系比较	(103)
图五二	小屯乙七基址与相关祭祀坑分布图	(105)
图五三	小屯乙七基址前与车马遗存平面图	(106)
图五四	小屯乙七基址前车马坑内马车车向关系	(107)
图五五	武官村北地祭祀坑	(109)
图五六	北窑 M446、M451 平面图	(113)
图五七	北窑西周早期随葬车马器墓葬墓例	(114)
图五八	北窑西周早期 M310 东壁立面及平面图	(115)
图五九	北窑西周中期墓葬 M144 平面、立面图	(119)
图六〇	北窑西周晚期墓例	(122)
图六一	张家坡带墓道墓葬墓例	(127)
图六二	张家坡 M152 平面图	(128)

图六三	张家坡竖穴墓墓例	(129)
图六四	张家坡洞室墓墓例	(130)
图六五	张家坡车马坑、马坑	(132)
图六六	北赵晋侯墓地墓葬分布图	(136)
图六七	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之马坑	(137)
图六八	北赵晋侯墓地一号车马坑之车坑	(137)
图六九	曲沃天马一曲村墓地葬车墓葬	(141)
图七〇	曲沃天马一曲村墓地 J4 区马坑 M6359	(144)
图七一	曲沃天马一曲村墓地车马坑、马坑墓例	(145)
图七二	上村岭虢国墓地随葬车、车马器墓葬及车马坑分布图	(148)
图七三	上村岭虢国墓地南区车马坑	(149)
图七四	上村岭虢国墓地北区车马坑、马坑	(150)
图七五	上村岭虢国墓地墓例	(151)
图七六	上马墓地车马坑	(158)
图七七	赵卿墓墓室平面图	(160)
图七八	赵卿墓陪葬车马坑	(161)
图七九	浙川下寺楚墓分布示意图	(164)
图八〇	浙川下寺 M2CH 平面图	(166)
图八一	江陵九店东周墓地发现之木栏(13: 29)	(169)
图八二	M104 与车马坑关系图	(170)
图八三	M104 车马坑平面图	(170)
图八四	战国銮铃	(191)
图八五	马鞍冢 2 号车马坑 4 号车车害	(191)
图八六	中山国成公墓车马坑出土之銮铃	(191)

插 表 目 录

表一	商周时期各类马车使用时段表	(34)
表二	各形态车马坑使用时段表	(69)
表三	车马合葬坑使用时段表	(70)
表四	车马分葬坑使用时段表	(71)
表五	各类车马埋葬方法使用时段表	(71)
表六	晋侯墓地葬车情况	(77)
表七	安阳殷墟西区随葬车马墓葬情况	(99)
表八	安阳殷墟西区四期墓葬随葬兵器及车马器情况	(99)
表九	安阳殷墟商代晚期车马坑内随葬兵器及工具情况	(110)
表一〇	洛阳北窑西周早期随葬车马墓葬比例	(112)
表一一	洛阳北窑西周早期随葬车马器墓葬比较	(115)
表一二	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大型竖井形与正斗形墓葬随葬车马器比较	(116)
表一三	洛阳北窑西周早期中型竖井形与正斗形墓葬随葬车马器比较	(116)
表一四	洛阳北窑西周早期车器与墓葬规模关系	(117)
表一五	洛阳北窑西周早期马器与墓葬规模关系	(117)
表一六	洛阳北窑西周早期随葬品共存器类关系比较	(118)
表一七	洛阳北窑西周中期随葬车马墓葬比例	(119)
表一八	洛阳北窑西周中期随葬车马器墓葬比较	(120)
表一九	洛阳北窑西周中期车器与墓葬规模关系	(120)
表二〇	洛阳北窑西周中期马器与墓葬规模关系	(120)
表二一	洛阳北窑西周中期随葬品共存器类关系比较	(121)
表二二	洛阳北窑西周晚期随葬车马墓葬比例	(121)
表二三	洛阳北窑西周晚期随葬车马器墓葬比较	(123)
表二四	洛阳北窑西周晚期车器与墓葬规模关系	(123)
表二五	洛阳北窑西周晚期马器与墓葬规模关系	(124)
表二六	洛阳北窑西周晚期随葬品共存器类关系比较	(124)
表二七	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随葬车马墓葬比例	(126)
表二八	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车马坑及马车数量与主墓对应情况	(131)
表二九	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随葬车马器组合	(133)

表三〇	北赵晋侯墓地各组晋侯夫妇墓葬车情况	(137)
表三一	北赵晋侯墓地随葬车马器	(139)
表三二	曲沃天马一曲村墓地随葬车马墓葬比例	(142)
表三三	曲沃天马一曲村墓地铜器墓随葬车、车马器的比例	(142)
表三四	曲沃天马一曲村墓地随葬车马器组合	(143)
表三五	曲沃天马一曲村墓地西周早期车马坑与主墓关系对照	(144)
表三六	上村岭虢国墓地车马坑与主墓关系对照	(149)
表三七	上村岭虢国墓地随葬车马器组合	(152)
表三八	上村岭虢国墓地随葬车马器与墓主关系对照	(153)
表三九	侯马上马墓地各期墓葬与随葬车马器组合	(156)
表四〇	长治分水岭东周墓随葬车马器组合	(162)
表四一	长子县东周墓随葬车马器组合	(162)
表四二	淅川下寺楚墓随葬车马器组合	(164)
表四三	淅川下寺楚墓随葬品摆放位置	(165)
表四四	淅川下寺楚墓车马坑情况	(165)
表四五	淅川下寺楚墓随葬马车情况	(166)
表四六	江陵九店东周墓地随葬车马墓葬比例	(168)
表四七	江陵九店东周墓地随葬车马器组合	(168)
表四八	大、中型楚墓随葬车马器情况	(171)
表四九	西周墓地随葬车马器特点比较	(175)
表五〇	先秦时期车马埋葬的类别及主要铜车马器组合	(183)
表五一	曲沃天马一曲村墓地与一般西周墓地随葬马车及车马坑比较	(184)
表五二	先秦时期车马坑区域性差异比较	(185)
表五三	先秦时期大型墓葬车马埋葬区域性特点比较	(185)

第一章 引 论

发现于1978年的曾侯乙墓遣策上记载了39种不同名称的车，向我们展示了战国时期人们在车的使用及分类上非常复杂的认识。本书欲由考古材料出发，一探先秦时期马车的发展状况，并进一步发现当时人们所赋予马车的一些特殊意涵。

一、发现与研究

（一）商周时期马车的发现

20世纪初，考古学引入中国，河南便成为商周考古最早的基地。30年代，随着安阳后冈、西北冈、小屯以及浚县辛村的发掘，研究者逐渐认识到车迹的存在。郭宝钧在《浚县辛村》中即指出，1号墓“大半个衡舆形制和多种车马饰的发现，如衡的翘起，矛为衡末，辘的中曲，轼若椅背，轡的竖立，銎在轭上，轮在两壁，轂饰六节等，这些都是从前所不知道，可说这一墓中第一次发现……”^[1]。虽然认识到车迹的存在，但是由于木质不易保存，加上对木车结构没有清楚的认识，发掘工作无法将车子的整体形态辨识出来。一直到1950年，夏鼐在辉县琉璃阁首次成功地将木车剥剔出来^[2]。这一发现对于准确地描述当时车的形制及对日后同类遗迹的发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才算是对于先秦时期马车的结构有一较完整的认识。此后，大量的木车在各地的墓葬、车马坑中被发掘出来，为我们认识先秦时期马车的复杂性及多样性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980年12月，秦始皇陵内出土了两乘大型彩绘铜车马，为研究秦代的乘舆制度提供了具体的实物资料^[3]，也为我们据之上溯到东周，乃至西周、商代的车制，提供了宝贵的对照资料。

车马器的发现较之马车的发现更为普遍。除了发现于墓葬陪葬的车马坑内，车马器也经常作为车、马的象征随葬于墓葬之中。车马器的发现及认识不仅可以作为墓葬断代的标准，更能依据其“形状、大小、出土位置，就可以获知有关个部分的比较准确的尺度。把年代相当、结构相近的若干车子的局部综合在一起，就可以装配出一辆在结构尺度上比较准确的殷代或西周的车子”^[4]。所以就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可以将车马器埋葬也视为一种马车埋葬的形式。

依时代区分，目前我们所见的马车及车马器的田野材料分布于以下几处：

商晚期：河南安阳小屯、后冈、侯家庄、殷墟西区、大司空村、武官村、刘家庄、郭家庄、梅园庄，安徽颍上赵集，陕西西安老牛坡、宝鸡斗鸡台、戴家湾、裕泉、渭南

南堡,山西浮山桥北、保德、武乡,河北灵寿,山东滕州前掌大、益都苏埠屯。

西周时期: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鹤壁庞村、鹿邑太清宫、洛阳老城、洛阳北窑、洛阳庞家沟、洛阳东郊、洛阳下瑶村、郑州洼刘、平顶山应国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陕西长安张家坡、长安沣西、长安普渡村、长安花园村、扶风黄堆、扶风召李、扶风飞凤山、岐山周公庙、北吕周人墓地、渭南南堡、宝鸡地区、宝鸡虢国墓地、宝鸡斗鸡台、宝鸡阳平、蓝田泄湖,山西天马一曲村晋国墓地、绛县横水、黎城、洪洞永凝堡,山东滕州前掌大、胶县西菴,北京琉璃河、昌平白浮,辽宁魏营子,甘肃灵台白草坡、宁县、崇信于家湾,宁夏固原,江苏丹徒烟墩山。

春秋时期: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新郑郑韩故城、新郑唐户、洛阳、新野、淅川下寺楚墓、淅川和尚岭、淅川徐家岭、固始侯古堆、固始白狮子地、桐柏县春秋墓,山西侯马上马墓地、闻喜上郭村、临猗程村、太原晋国赵卿墓,陕西韩城梁带村、陇县边家庄、户县宋村、宝鸡西高泉村、凤翔雍城陵园、凤翔八旗屯、凤翔马家庄,甘肃礼县圆顶山,山东曲阜鲁国故城、滕州薛国故城、临淄后李、河崖头、长清仙人台、阳谷景阳冈、沂水刘家店子车马坑、莒南大店、蓬莱,河北邢台葛家庄,甘肃灵台景家庄、湖北随县(今随州)、丹江口市武当山、麻城李家湾、江陵九店、枣阳郭家庙、当阳赵家湖楚墓、当阳曹家岗,安徽舒城九里墩寿县蔡侯墓,江苏邳州九女墩吴县何山、丹徒北山顶、镇江谏壁王家山、六合程桥。

战国时期:河南洛阳市针织厂、洛阳西工区、洛阳中州路、洛阳彭婆乡刘沟村、新郑、新蔡、辉县琉璃阁、固围村、汲县山彪镇、陕县后川墓地、淮阳马鞍冢楚墓、信阳长台关楚墓,陕西洛南冀塬、凤翔芷阳陵园、凤翔西村、凤翔八旗屯西沟道,山西长治分水岭、芮城、榆次猫儿岭、原平峙峪、潞城潞河,河北丰宁、燕下都、中山王墓、灵寿城、邯郸赵王陵、邯郸百家村、怀来北辛堡,山东临淄淄河店、临淄商王墓地、长岛王沟,湖北宜城罗岗、熊家冢、江陵天星观、曾侯乙墓、包山楚墓、鄂城楚墓、信阳楚墓、江陵藤店、江陵雨台山楚墓、江陵九店、江陵望山、沙冢、孝感、襄阳蔡坡、枝江姚家岗,湖南临澧九里双峰包、湘乡牛形山、长沙识字岭、长沙浏城桥,甘肃平凉庙庄、秦安上袁家、张家川马家塬,安徽长丰杨公、赵家孤堆,江苏淮阴高庄。

综合言之,目前发现的田野材料主要为墓葬及车马坑,居址及作坊很少发现车及车马器,仅于安阳刘家庄发现一非丧葬用之车舆残迹,沣西居址发现一件骨耒,岐山周公庙铸铜遗址、侯马铸铜遗址以及中山国灵寿城发现车马器陶范。祭祀遗迹中,仅侯家庄西北冈祭祀坑、小屯乙七基址前及凤翔马家庄建筑基址前发现埋藏马车的祭祀坑。商及西周时期车、车马器的发现集中于中原地区。东周时期则普遍发现于中原、秦、楚等地,位处东南的吴、越地区发现较少。周边地区仅于西部、西北部、北部发现车马器,西南地区如巴蜀、云贵等地区不见。时间上,马车最早见于殷墟一、二期之际的山西浮山桥北基地的 M1 和 M18。目前,晚商时期已发现的车马器种类有耒、耜、轂饰、衡末

饰、轸、轳、轳、軛饰、踵饰、軛饰、輿饰、銜、鑣、钉齿器、节约、泡等。西周时期种类最多、形式变化多样，计有害、辖、轂饰、銮、軛、軛、轸、衡末饰、衡中饰、衡内饰、轴饰、踵饰、輿饰、軛饰、鑣、銜、当卢、马冠、节约、泡等。东周时期器类较少，发现的车马器以害、辖、銜、鑣、节约、盖弓帽为主。

除了车及车马器之外，部分遗址内也发现了车辙，以及带有“车”字的甲骨刻辞及铜器铭文。有些东周时期的器物也以车行人物或车纹为装饰。这些材料也应视为与马车相关的重要资料。

大量的考古材料为我们进行较全面、细化的分析及复原带来可能。过去学者对先秦时期马车的研究必须大量仰赖于车马器的形制与出土位置。现在，大量发现的马车实物为我们进行复原以及结构的研究提供便利以及更高的准确性。但是，就已发现的考古材料而言，仍然有些许不足之处。各地方木车的保存状况不同，倒塌、变形、清理时错误的判断，尤其是一些不带有铜车马器的木车结构，或是车的结构上含有大量的不易保存或不易辨认的物质（如皮革、布帛等），都使我们无法正确地辨识某些特殊的车种。此外，由于材料过分地集中于墓葬单位，使我们很难准确地指出当时社会上的日常用车情况。因此，我们只能依据目前的材料分析墓葬中葬车的一些规律，或是当时随葬车辆的形态，而无法据之以复原当时社会完整的车制以及车种。另一方面，王陵材料的缺乏，使得我们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只能对这一最高等级的墓葬情况进行猜测或是忽略不计。这些都会导致本题研究的不完整，并且，在讨论到当时社会用车方式以及用车概念等问题上，可能无法提出充分的考古学证据。

（二）商周时期马车的研究概况

汉代便已开始了对商周时期马车的研究，但是科学考古学的研究工作则是随着殷墟及浚县辛村的发掘而逐渐展开的。下面就目前的研究现状，将学者们在先秦马车研究上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分别叙述如下。

· 马车结构的复原

马车结构的复原一直是马车研究中最热门的问题。车制的研究起于汉代，但古代对车制的研究主要是着眼于对经籍的考释。清代的考据学家虽然也是以解经（尤其是对《周礼·考工记》）为目的对先秦车制进行研究，但已开始着力于车的形态、细部的复原，并以图像表示^[5]。近代在还没有充分的考古材料之前，马车结构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文献材料进行的^[6]，但其方法及目的已不同于清代的考据学。1924年，罗庸即曾依据戴震的《考工记图》和阮元的《车制图解》先后制成两种周代的木车模型，以实体的模型来验证戴震和阮元的错误^[7]。

1930年代殷墟及浚县辛村的发掘，使研究者得以依据较多的实物材料对商周时期的马车进行复原。早期的复原工作主要是由石璋如、郭宝钧进行的。郭宝钧由辛村的发

掘而特别关注车马的问题，其在车马研究上的成果集中体现于《殷周车器研究》一书中。书中将当时所能见到的车迹、车马器按马车结构上转动、曳引、承载、系马四个部分分别讨论，并根据车马器的形式、尺寸、出土状况复原了部分不清楚的木车结构、尺寸，再从发展的角度对商周车制的演变发展进行了贯通的研究^[8]。石璋如则以殷墟发现的商代车马、车马器为关注焦点，多年来先后发表了《殷代的弓与马》、《殷代的车》、《小屯四十号墓的整理与第一类甲种车的初步复原》、《殷代第一类车的舆盘之演变》、《殷代的第二类车》、《殷代车的研究》、《殷车复原说明》等^[9]多篇讨论商代马车形制的文章。石璋如以遗址出土的铜车马器的形式、位置以及田野工作中所见的木车、马遗迹位置，致力于商代马车的复原工作，并曾结合考古发现的车迹进行实物复原^[10]。除了对马车进行复原，石璋如更进一步地以车辵及舆盘交界处所使用的軛饰与踵饰的形制与结构，以及舆盘周围及舆轡周边有无装饰品为依据，对殷墟所见马车的辵及舆盘形制进行类型学上的分类。以配有形式简单的軛踵，并于盘轡配有装饰品的马车为第一类车；配有结构复杂的軛踵，但无盘轡装饰的为第二类车。每类之中又可依舆门的方向分为甲乙两种^[11]。

马车结构的问题很早便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日本学者矢岛恭介于1928年便发表了关于先秦车制复原的研究^[12]。英国学者 William Weston 在1961年也发表过中国青铜时代马车的想象复原图^[13]。近年则有美国学者 Anthony Barbieri-Low 以数码三维的形式对安阳郭家庄 M52 内的马车进行复原及结构分析^[14]。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层面最大的当推日本学者林已奈夫。林已奈夫广泛使用考古及文献材料，曾发表多篇与先秦马车相关的研究论文^[15]，也曾对西周马车进行图像复原^[16]。其《中国先秦時代の馬車》^[17]一文按考古遗迹、马车的图像表现（如古文字中的“车”、金文中与马车相关的字词、铜器上表现马车的花纹）、《周礼·考工记》等材料全方面地论述了商周时期的马车构造、性能，并更进一步地将先秦马车放在世界范围内讨论。其研究就今日看来或许有些许错误，但其通过全面地使用材料、细致地分析所得的结果，至今仍有相当的重要性。加拿大的史安妮（Barbara Stephen）对商代车制的研究另辟蹊径，由商代马车舆盘的多样性（椭圆与方形），与西方早期马车的情形对照，讨论其中可能蕴涵的社会或功能上的意义。其研究虽过度简化马车的功能，也未就社会意义展开讨论，但仍在思路中具有启发性。

近年来也有许多学者着力于商周车制的复原。除了对考古发现的马车遗迹进行复原并详细发表于考古报告、专文进行车制研究外，更有许多学者将各遗址发现的马车遗迹综合起来讨论。对个别时代或遗址出土马车的研究如杨宝成^[19]，郑若葵^[20]，张彦煌、张岱海、胡良仙、甘明轩^[21]等对商车的复原与研究；张长寿、张孝光对小屯 M40、辛村 M1、井叔墓马车的复原^[22]；林寿晋对虢国墓地木车的复原^[23]；渠川福据太原赵卿墓车马坑出土木车对东周车制的复原^[24]；张彦煌等对临猗程村出土木车的复原^[25]；王厚宇、王卫清对淮阴高庄战国车舆的复原^[26]；魏成敏对临淄齐车的复原^[27]，等等。刘